

百年
文学
论丛

Wenxue

Luncong

程致中 ● 著

穿越时空的对话

——鲁迅的当代意义

 安徽教育出版社

Bainian
Wenxue
Luncong

百年
文学
论丛

程致中 ● 著

穿越时空的对话

——鲁迅的当代意义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穿越时空的对话: 鲁迅的当代意义 / 程致中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12

(百年文学论丛)

ISBN 7 - 5336 - 4311 - 9

I. 穿... II. 程... III. ①鲁迅 (1881~1936) — 思想研究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I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211 号

责任编辑: 丁 蔚

装帧设计: 朱 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0 000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5.5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822632

邮 编: 230063

出版者言

《百年文学论丛》继《海棠文丛》(一、二辑)、《金蔷薇论丛》之后面世了。这是一套专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丛书。文学在上个世纪是一个显赫的文化艺术门类。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它是文化变革的最重要生力军,新文化运动中,很难想像没有新文学运动;同时文学又是社会变革的武器,参与了血与热的社会斗争。总结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为之献身的行当,大学设有专门的学科。过去这段文学比照中国古代文学,名之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建国为界划分现当代。时至 80 年代中期有人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整合现当代文学学科,运用整体眼光看待这百年的文学,而不是分段的割裂式的。这一概念已为学术界所接受。这套书原拟以“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为丛书名,但几年前我社已出过这样一套丛书,由严家炎、严云绶两位教授主编的。后改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书”,稍感老化,故改为“百年文学论丛”。运用百年文学的整体视野去研究这段文学,是这套书作者的共同追求,即便在研究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或某个文学现象时也是如此。

百年文学,不止百年;20 世纪文学外沿已逾越 20 世纪的上下限。它的诞生点在 19 世纪末,它还正在生长蔓延,走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文学批评在延展,文学研究在深化。我们这套书是这种延展、深化的一部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辑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

——《文化偏至论》的方法论意义	3
《摩罗诗力说》与比较文学	17
《摩罗诗力说》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	28
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的接受与超越	39
《示众》的文学渊源和艺术创造	55
《孤独者》与《工人绥惠略夫》比较论	63
论鲁迅、胡适对易卜生戏剧的文化选择	77
鲁迅前期小说中的尼采影响	91
鲁迅与西方人道主义	100
鲁迅对进化论的择取和扬弃	117
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尼采学说	130
论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	149

第二辑

鲁迅和当代中国的对话	165
——世纪末鲁迅论争引发的思考	
20 世纪文艺观念变革的宣言	181
——论《摩罗诗力说》的文艺美学思想	
鲁迅论文艺创作的自觉性	190
鲁迅关于文艺真实性的辩证思考	203
毛泽东《讲话》与鲁迅文艺思想	220
弘扬鲁迅的爱国主义	234
鲁迅对现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242
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	257
鲁迅对国民奴隶根性的反省与批判	264
科学学理精神的倡导和实行	276
——读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	
附录：“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问卷调查)	288
跋	297

第一輯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

——《文化偏至论》的方法论意义

1908年7月,鲁迅在《河南》月刊上发表的重要文化批判论文《文化偏至论》,对西方19世纪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张扬了以尼采为宗主的个性主义文化思潮,提出了“立人”→“立国”的文化建设纲领。鲁迅在论文中提出的有关文化选择的指导性原则和方法,尤其值得重视。细读此文,不仅有助于把握青年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鲁迅与中外文化的关系,还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一

《文化偏至论》开篇,鲁迅结合晚清的思想文化背景,陈述了本文的写作动机。

自黄帝轩辕氏打败蚩尤定居在黄河流域以来,中华帝国屹立于世界中心,没有可以较量的对手,因此传统中国人“益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①这种妄自尊大、坐井观天的闭关自守的文化心态,直到鸦片战争时候才被打破。海禁大开,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华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亘古未有的恐慌与躁动。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至少在“工艺”、“政制”上具有华夏文明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民族危机的刺戟下,他们发现,先前视为“蕞尔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于此文。

小蛮夷”的藩邦文化，原来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稍稍听说过一点新学名词的人，自惭形秽，摇身一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掎击旧物，惟恐不力”。当时的洋务派、改良派人士，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异口同声地倡言“兴业振兵”，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则鼓吹君主立宪并成立欧洲资产阶级的国会。鲁迅对这种“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的盲目接受西方文化的社会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在鲁迅看来，一切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因矫正旧事物而发生“偏至”，西方文明的“偏至”是非常明显的。鲁迅为什么写作此文呢？他说得明白：“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惟疾其已甚，施之评弹，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可见，鲁迅回顾欧洲 19 世纪文明，介绍新理想主义的目的，不止于揭发西方文明的“偏至”，还要对当时思想界盛行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思潮进行批判。

针对晚清思想界盲目西化和闭关自守的文化心态，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文化继承和文化选择的原则：“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鲁迅在这里非常卓越地提出了文化选择中如何处理中外古今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和方法。

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显然是一条全方位开放的文化发展原则。在中外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鲁迅主张以世界的眼光、平等的态度对待西方汹涌而来的异质文化，既不以“傲睨万物”的态度视为蛮夷文化而加以排拒，也不以“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态度视为绝对先进的文化而顶礼膜拜。他认为，无论传

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为 20 世纪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有益的质素。在与古今的关系上,鲁迅提倡“取今复古”。构建 20 世纪的新文化,既要追随时代的潮流,又要“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在批判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时,流露出对于古代文化精神的时时眷顾,表明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谈到,中西文化精神“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鲁迅则兼取中西文化之精髓,完整地做到了“好古而不忽今,力今而不忽古”,将“好古”与“力今”结合起来。

鲁迅在本文中提出的文化选择原则,也是一条锐意创新的原则。依据历史进化的观点,鲁迅认为“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一切文明在发展途中都要发生偏至,这种唯物主义文化观使得鲁迅在审视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时,能够保持几分冷静,既反感于那些“耳新声而疾走”的盲从西学之辈,又抨击那些“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的复古主义者。(《坟·摩罗诗力说》)面对西方文化,他要求“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而“取今复古”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别立新宗”,建构一种“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的新文化。

鲁迅渴望创立的文化“新宗”,是中外古今的结合,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融。那时他特别推重摩罗诗派“反抗挑战”的文学作品,既赞美这些欧洲浪漫派诗人具有令人神往的现代个性品格,又肯定他们各具民族特色(“各禀自国之特色”),显然也是采用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基本尺度。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走的也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新路向。既然中外古今的文化都是有“偏至”的文化,那么创新之路就在于纠偏、互补、融合,从而创立一种具有新形新质的文化。

《文化偏至论》不仅非常卓越地提出了一条极具开创性和指导

性的文化选择原则,而且在研究西方文化发展史、西方思想家的实践活动及其贡献时,总是以现实社会和历史发展作为根本的参照,并以这一参照作基础,显示出几条相互联系的文化(科学)研究的先进方法。

其一,历史的系统的方法。

鲁迅认为,研究特定时期的文化思想,必须做到“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探究“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这就对研究工作提出了追本求源并探索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要求。他认为西方文明发展到19世纪后叶,最大的偏至是崇拜“物质”与“众数”。他在得出这个否定性的结论时,并不忽视“人事连绵,深有所本”的发展规律。历史地回顾西欧文明发展的过程,他又给予“物质”、“众数”以历史的肯定。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分析,做到褒贬有加,令人折服。在科学研究中,鲁迅反对“以当时人文所见,合之近今”的做法,认为只有“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归其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才能做到“所论始云不妄”。(《坟·科学史教编》)

其二,比较研究的方法。

传统中国人为什么会产生“抱守残阙”、“益自尊大”的劣根性?鲁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惟无校讎故”。“校讎”以及“缘督校量”、“权衡校量”等词语,都强调研究工作中要以正确的标准进行比较衡量,这是鲁迅关于发展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科学史教编》中,鲁迅还提出一种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盖凡论往古人之文,加之轩輊,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就是说,评论古代文化的成就,应以另一民族相当时代的文化来作比较,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文化偏至论》谈到19世纪末新理想主义一派思想家,都有强调主观精神或意力至上的共同思想主张,却又有不同的旨趣。尼

采、易卜生诸人颂扬主观的尊贵和内心的光辉，竭力反抗时俗；而契开迦尔更以主观意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至高标准，一切道德行为不管造成怎样的后果，统统依据主观的善恶去作判断。鲁迅运用比较的方法显示出新理想主义者们的不同的思想特色。

《摩罗诗力说》这篇比较文学论文，尤其注重比较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不同思想家或摩罗诗人的思想主张和创作个性。尼采和拜伦都“欲自强”，但尼采颂强者，反人道；拜伦则抗强者，援助弱小民族，从比较中突出拜伦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相交融的思想特征。在这篇长文中，鲁迅盛赞摩罗诗派共有的“争天拒俗”、“反抗挑战”之声，但又十分注意辨析他们由民族社会形成的创作个性。例如，普希金曾受到拜伦诗歌的影响，其“小诗亦摹拜伦”，可是他的代表作《高加索的囚徒》、《茨冈》等长诗，“虽有拜伦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鲁迅显然以民族、社会作背景，指出普希金的创作个性及其形成的根据。

其三，审时度势的方法。

鲁迅主张以现实的、时代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类文化遗产。他否定那种“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的泥古蔑今的文化态度，他说某些杰出的思想，古胜于今的事虽然并非没有先例，然而“学则构思验实，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坟·科学史教编》）。所谓“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分明是强调文化选择工作的现实性和民族性立场。

《文化偏至论》对西方文化史的评述，尤其对“物质”、“众数”的分析，就运用了审时度势的方法。“物质”、“众数”在反封建斗争中功不可没，但“流风至今”，“信用弥坚，渐而奉为圭臬”，就成了偏至之物了。“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鲁迅批评那些“竞言武事”的新派人物，“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将西方文化中早已陈旧的“迁流偏至”之物，不加选

择地“举而纳之中国”，其实是盲目无知的糊涂虫。

鲁迅早年提出的这些文化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理论上是极其严密精确、无懈可击的，它是青年鲁迅最具独创性的天才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些原则和方法的应用，当然不是孤立自是，而是相辅为用，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辩证思维的特点，颇具科学的实用价值。

二

什么是鲁迅所理解的“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鲁迅早期怎样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呢？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以世界的眼光，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自古罗马统一欧洲以来，欧洲人有了共同的历史。教皇的权力控制全欧，人民失去了思想自由，于是德国人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抨击旧教，创立新教，废除了教皇权力。但是推翻教皇依靠了君主权，宗教改革后君主的权力更加扩大了。物极必反，人民行动起来，英、美、法爆发了大革命，“扫荡门第，平一尊卑”，倡言自由平等、社会民主，这当然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拨，是历史的进步。到19世纪后叶，欧洲文明却发生了两大弊端：“曰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

鲁迅并不否认物质文明的发展对西方社会的推动作用，他看到工业文明的进步使“世界之情状顿改，人民之事业益利”。但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社会“唯物”极端的倾向。他认为不能光强调物质而忽视了精神，如果物质崇拜趋向极端，甚至拿它作为惟一的标准（“奉为圭臬”），用以衡量精神领域的一切现象（“范围精神界所有事”），使人人成为物质的奴隶，就必然导致人的主体精神失落。很明显，鲁迅这里所说的“物质”和“唯物之倾向”，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和“唯物主义”，他把19世纪后叶的西方社会称为“物质”

社会,其所谓“搯物质”、“非物质”,就是批判西方社会“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的弊端。

对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民主政治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鲁迅给予充分肯定。他赞美法国大革命如暴风骤雨,“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在鲁迅看来,铲除人与人的等级差别,将政治大权交给百姓掌管,是“民主”的功德;如果发展到“众治”崇拜,动辄皈依于“众治”,迷信“民主”,也是非常危险的。封建时代是“以独虐众”,西方社会是“借众以凌寡”,“以众虐独”,以多数人的专制代替君王的独裁统治,专制主义的实质没有改变,甚至“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人的奴隶地位并没有改变。可见,鲁迅所谓“排众数”,并不是反对人民大众,而是反对少数人借用多数的名义压制杰出个人,反对阻碍个性发展的“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的西方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要废除任何形式的专制和奴役关系。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尖锐地提出了“物质与精神”、“众数与个人”这两个二元对立命题,对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通弊表示强烈不满,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进步、精神退坡这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和危害。他说:“……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来的种种罪恶,也曾引起西方知识界的普遍不满和失望,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了猛烈抨击。在这股世界性潮流影响下,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党人也希望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中国重演。鲁迅对西方社会“通弊”的批判,确实做到了“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化建设的出路在哪里呢?鲁迅从欧洲19世纪末叶兴起的新理想主义者那里拿来了主观和意力主义。他肯

定施蒂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张扬叔本华的“主我扬己而尊天才”及“意力为世界之本体”说、尼采的超人学说、易卜生的“反社会民主之倾向”，以为“恃意力以辟生路”将是“二十世纪之新精神”。

在鲁迅的视野里，西方文明有“枝叶”和“根柢”的分别。物质、众数、科技等，均为枝叶；惟有人，人的意志和精神，才是根柢。所以他倡导“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新方案。所谓“任个人”，就是肯定“个性的尊严，人类的价值”，尤为重视先觉之士、天才明哲的作用。所谓“张灵明”，就是张扬意力，发扬人的内部精神，在《破恶声论》中表现出对于“心声”（心灵的呼声）和“内曜”（内在精神的光耀）这样理想的精神境界的热烈向往。他认为发扬人的内部精神是“人类生活之极巅”，而理想的人格，即是“意力轶众”之人。拿这个标准去观察当时的社会群众，他得出“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伦俗横行，浩不可御”这样悲观的结论。

在主观上，鲁迅力图以“非物质，重个人”的文化纲领来矫正西方文明的偏至，希望避免崇拜“物质”、“众数”的通弊在中国横行，但他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封闭而落后的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近代工业文明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缺少这两个基本条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缺少了物质力量和政治基础。“任个人”和“张灵明”（即“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启蒙主义主张，“立人”→“立国”的社会理想，反映了鲁迅在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敏锐的思想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但是由于受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他又提出“是非不可公之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之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等主张，将个人与群众尖锐地对立起来。指望“天才大士”凭借“绝大意力”、内心光辉去拯救“庸众”，其实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因此，青年鲁迅“非物质，重个人”的文化主张虽有一定的理论